

被看见，潮汕青年的文学世界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孙磊 图/羊城晚报记者 蔡嘉涛

青年是文学事业的未来。为发掘有潜力的青年作家，2024年4月，羊城晚报精心策划“粤派评论·现场”青年作家系列访谈《到灯塔去》，用多种媒介形式报道四位青年作家——索耳、梁宝星、宥予、巫宏振的故事，引发广泛关注。

为了让更多青年作家被看见，本期《到灯塔去》聚焦潮汕青年写作群体，以陈润庭、黄守昱为样本，一窥潮汕青年的写作，呈现他们对时代的关注与理解，对文学的坚守与思考。

“我有五个亲姐姐，她们对我写作的影响超出了我的想象。《走仔》这本书就是我送给她们的。”黄守昱翻动家庭相册，四个笑靥如花的女孩中间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男孩。

“走仔”在潮汕话里是“女儿”的意思，泛指远去的孩子，也是黄守昱首部小说集《走仔》中主人公的代名词。这本书收录了十个南方故事：澳门的手套家庭、渔村仁海村每年的鱼王祭、不愿走入婚姻的吴文霞和生病的母亲拉扯……

由于从小跟姐姐们一起长大，“家庭”和“女性”对黄守昱而言，无形变成了他自我剖析的工具和思想资源。“当我追溯自己写作道路的源头，会发现不少故事是站在女性视角来叙事。在设计某些场景时，我也会不自觉地想到，如果让女性面对这件事，她们会怎么做。”



“我竟然还记得！”陈润庭在书房里大叫，距离上一次他玩悠悠球已有十多年了。他向记者逐一展示摆在桌面的儿时玩具：模型车、“宠物小精灵”手办、陀螺、悠悠球……

作为一个出生于“玩具之都”澄海的孩子，玩具在他的童年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，也给他带来了隐性而根深蒂固的影响。如同被各色玩具所簇拥的《超级玛丽历险记》，那是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，蓝底书封充斥着上世纪90年代的怀旧复古感。

黄守昱：潮汕生活让我对家庭题材高度敏感

1 讲故事的“家庭传统”

我是潮汕人，我有五个亲姐姐。可能因为有着她们的陪伴，我看待性别会更加复杂一些，习惯性地去做标签化。她们也影响了我的书写，《走仔》这本小说既源于我的家庭，也源于我对家庭题材的高度敏感和关注。

当我为了教写作课，找回自己写作的生活起源时，我发现了这个故事：小时候我跟最小的姐姐一起上学，从家门口穿过城中村，再过马路，走到对面的学校，这段路通常是漫长无趣的。为了打发这些时间，我就给姐姐讲故事，那时候爱看《倚天屠龙记》，编的都是武侠类的故事。

我会告诉她，这些故事是我从电视上或书上看到的，从而获得给姐姐讲故事的正当性。当我发现她打哈欠或者眼神开始游离，我就会想，看来需要调整我的故事了，最常用的方法

是设置悬念来吊她的胃口。那时的我还没有“写作”的意识，但我可以从她的表情、神态看出这些故事是否符合逻辑。所以我说，我最小的姐姐是我最早的读者。一个不太高明的读者，遇上一个同样不太高明的输出者，一切都刚刚好。在那个青涩的年纪，我的姐姐正好满足了我所有讲述的欲望，并让我从中获得了一种很原始的快乐——讲故事的快乐。

至于我的父母，他们是我最早的老师。他们都很擅长讲故事，这种讲故事的“家庭传统”，为我探索写作中的对话和心理描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。一些拉家常、聊八卦的语言技巧让我学会了如何通过言外之意传达更多的信息。我在写作中经常借用这种语言风格，用来塑造人物心理活动和语言表达之间的一致。



2 我是一个“故事主义”写作者

《走仔》小说集是我在2017年到2022年之间创作的，这也是我从读研到进入社会工作的阶段。较早的作品是《走仔》《跨界》，较近的作品是《姚美君》《七星女》。有些读者会觉得，我在写女性的故事，故事里的男性也是“出走”的角色。

实际上，我是一个“故事主义”的写作者，服务于故事本身。在写作时并没有一个前置性程序，让我“决定”写女性的故事。我对女性故事的迷恋，大概源于我对女性的观察机会比其他男性更多一些。

在我的家庭，以及我所接触到的潮汕家庭里，女性往往承担起“黏合剂”的功能，而男性在经济压力下承担更多一

些。所以当我说起家庭故事时，男性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消失或退场。我觉得女性是很有魅力的，我的姐姐们各具性格，她们勤奋、坚韧、乐观向上。书写她们，重新发现她们，对她们来说不一定有意义，但对我来说，《走仔》是送给她们的礼物。

同样地，我会根据故事适合的地域来选择语言，让它去“发声”。这当然也受到了文化背景的影响，比如港澳的文明发展程度和语言建设较为完善，我们对港澳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追慕感。

我并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，我认为每个地方的语言都可以使用。如果这个故事适合用粤语讲述，那么我就会用。

3 写农民工不是出于同情

写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它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，也是一种自我救赎的途径。回想起来，我在初中时的拙劣作品可能“救”了我自己。如果没有写小说，我可能会因为负面情绪而陷入困境。写作让我能够释放这些负能量，并通过小说的角色来宣泄。

我15岁时离家出走，当时跟家人的关系很紧张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学习不太好，沉迷于写小说。那时候觉得与其读个大专，还不如去打工。潮汕当地有个说法叫“打死工不如做老板”。

于是我通过朋友的介绍在厦门打工，从学徒开始做起。早上6点上

班，迟到1分钟扣1块钱，下午3点左右下班。主要任务是跑堂、上菜递菜，有时要兼职外卖送餐。

大概两个月的时间里，我每天观察来吃饭的工人，下班后玩游戏逛街的同事，还有那些坐在写字楼里、说话客气但从不正眼看我的人。我清楚地意识到，我们的精神性追求不一样，我只喜欢写作。后来，我在小说里写农民工，不是出于同情，而是因为我曾经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个劳动者，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。

有时候，人们认为作家的灵感来源于童年。但我认为，不幸的童年和不幸的当下同样能够提供丰富的素材。现在我的生活比以前平和许多，

这也是一种新的体验。我们这一代面临的压力很大，不少年轻人的精神状态面临挑战。关注自我并不是坏事，但有时候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他人。写作是一种解决精神困境的有效方式，因为它成本低且能够提供精神上的支持。

现在我在一所大学里教写作课，我经常跟学生们讲：不要忘了文学，即便你将来可能被生活中的劳碌所淹没，但是希望你在被淹没的时候能抓住一根稻草，而这根稻草就是文学。这句话也是我对自我的一种鞭策。

总策划：任天阳
总统筹：林海利
监制：陈桥生
策划：邓琼 侯恕望 吴小攀
统筹：孙磊 刘颖颖

陈润庭：希望我的创作可自由切换孩子和大人

1 源于童年玩具的虚拟快感



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二楼，楼下就是县城的电脑一条街，也是我放学的必经之路。每次上学跟放学，我都要经过这条充满诱惑的街道，经常受不住诱惑去买游戏光盘。那时候电脑店里一般卖着两种游戏光盘，正版的很贵，盗版包装简陋，但很便宜。我经常“混迹”于这些电脑店，也因此玩了不少游戏。

我到现在还记得，我们家安装电脑的那个中午。对我来说，那个时刻的意义不亚于《百年孤独》里奥雷良诺上校的父亲带他去冰块的那个下午。一按下电脑主机键，耳边就会传来类似引擎启动的声音。那个声音对我来说，是一种很强烈的兴奋感，预示着一个新世界开启了。

我玩过的很多游戏都和历史故事有关，比如说“太平天国”“烽火三国”

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二楼，楼下就是县城的电脑一条街，也是我放学的必经之路。每次上学跟放学，我都要经过这条充满诱惑的街道，经常受不住诱惑去买游戏光盘。那时候电脑店里一般卖着两种游戏光盘，正版的很贵，盗版包装简陋，但很便宜。我经常“混迹”于这些电脑店，也因此玩了不少游戏。

我到现在还记得，我们家安装电脑的那个中午。对我来说，那个时刻的意义不亚于《百年孤独》里奥雷良诺上校的父亲带他去冰块的那个下午。一按下电脑主机键，耳边就会传来类似引擎启动的声音。那个声音对我来说，是一种很强烈的兴奋感，预示着一个新世界开启了。

我玩过的很多游戏都和历史故事有关，比如说“太平天国”“烽火三国”

2 希望成年人葆有信以为真的天赋

给我写作带来一些信心。但我父母其实不太支持我写，尤其是我爸，他非常希望我不要做文学专业，毕业后找一份“正儿八经”的工作。

作为一名职业作家，一直以来都是我所希望。但在如今，把写作当成职业意味着很多，包括生存与妥协。在我看来，我想写什么、怎么写、我在看什么，它远大于写作能给我带来的收入。我之后会变成职业作家吗？好像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。

我喜欢写东西，就像儿时喜欢玩游戏、玩游戏一样。小的时候，渴望通过游戏进入成年世界，但是长大后，却发现儿时的想象很多都是假的，自己

在逐渐丧失儿时对一切“信以为真”的能力。

仿佛人长大的过程，就是天赋丧失的过程。这也就是小说集里的《纸城堡》的主题之一：小说怎么从轻盈变得沉重。我用了“驱魔”的方式来表现这个主题，小孩都是有魔力的，但随着他不断长大，这种魔力在逐渐消失。

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人社会化的过程。社会化之后的人，往往希望事事利益最大化，但也很容易陷入理性的陷阱，探索自身存在意义。所以我希望成年人也有不做主线性任务的任性时间，葆有信以为真的天赋。

3 我感觉到自己离不开南方故乡

对我来说，写作就是我在存在的方式。我没有办法想象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。事实上，“非存在”才是最恒常的一个状态。“活着”就像是一个人睡了很久的觉，中途突然醒了一会，然后很快地重新陷入睡眠。我们的生命就是这片刻的清醒，我们要在这一片刻的清醒里做什么、想什么，或者说用什么来记录我们的清醒，对我来说就是写作。

《超级玛丽历险记》不仅限于游戏本身，它还是一种对待世界、对待人生的态度。我经常说，写作并不是一件躲在书房里就能做好的事情，外部

世界有时更值得我们去探索。尤其在今天，大家都躲在手机、电脑屏幕后，经常冷落我们周遭的世界。很多时候，只要我们去街上走一走，就能收获各种各样的故事。

读完研究生后，曾经有半年时间，我都在荔湾湖上的一家酒馆工作。那时每天都有很多大爷大妈找我聊天，我坐在边上，保持着一种开放的状态。到了空余时间，我就到荔湾老城区周围转转。我觉得写作要在生活里去写，强调生活的沉浸感，和生活产生联系，这对于写作很有益处。

而在北京读博后，我会用写作的方式去回望故乡，回望童年的玩具。我真正地感觉到自己离不开南方故乡，

不管在外貌、口音还是生活习惯，我都和北方同乡们有着明显差异。我重新发现家乡的人，那些命运和玩具产业休戚相关的人。

我最近的爱好是阅读一些地方的历史文献。在叙述的缝隙之中，经常都藏着历史的偶然性。对于今人的我们，历史似乎是尘埃落定的。但对于历史的同代人来说，历史是他们的当下，是正在进行的，具有无限潜能，同时也是迷雾一片。

我很好奇身处历史漩涡之中的个体，他们所思所感中的远见与盲视。有时候我会尝试着代入他们的视角，设身处地地展开想象。而这种有限的想象，帮我打开了重新审视历史的眼光。

40年：用“打工文学”讲述20世纪中国的发展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

10月16日，“劳动者之光：打工文学40年回顾展”在深圳（宝安）劳工博物馆正式开展。展览通过大量的文献、图片、音像资料，以历史事件为脉络，重要事件为节点，追溯自1984年以来“打工文学”的发展历程，展现了“打工文学”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。

当天，举行了“打工文学的历程、价值与未来展望”的专家交流会。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杨宏海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、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柯雷、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柳冬妮、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于爱成、羊城晚报高级编辑吴小攀等与会嘉宾围绕“打工文学”的概念内涵、多元价值、本土发展和海外传播等话题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。



研讨会现场嘉宾：杨宏海、柳冬妮、柯雷、李杨、于爱成、吴小攀（从左到右）

期待把“打工文学”写入文学史

1984年，打工者林坚创作的短篇小说《深夜，在海边有一个人》在《特区文学》（第3期）上发表，被认为是“打工文学”最早的作品之一。小说描绘了主人公在深圳这座新城市的生活经历，反映了当时广大外来务工人员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。

杨宏海是最早提出“打工文学”这一概念的人之一。在他看来，“打工文学”是深圳劳工最早发自内心的呐喊，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，打工者的创作既是“心灵的呼唤”，也是一种“真实的文学”，有“毛茸茸的生活的感觉”，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城市经验与中国经验。

“打工文学的编撰、出版、研究建立了一座纸上的博物馆。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表示，深圳从小渔村发展为大都市的历程，不是写在一部部文学作品中的。“这些人的生命经验与人生梦想，他们的希望与绝望，都在文学、文学作品里。”

在李杨看来，“打工文学”凝结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历史与记忆，浓缩了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共同经验，有了共同的生命体验，才会不断产生家园的感觉，深圳才能被人看见、被人记住。“我觉得深圳应该有

一座打工文学馆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，比博物馆、图书馆、艺术馆重要得多。”同时，李杨也强调了“打工文学”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，“我现在特别期待把打工文学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，用打工文学讲述20世纪中国发展的历史”。

“打工文学”的世界谱系

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，打工者群体迅速扩大，越来越多打工者加入写作行列，从张伟明、安子、黎志扬、周崇贤，到王十月、郑小琼、塞丁、丁燕等，他们的写作陆续斩获重要奖项，并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。

据杨宏海介绍，“打工文学”以其独特的魅力引起了海外文学界专家的关注。荷兰莱顿大学的柯雷教授，曾专程就“打工文学”到深圳采访，目前正在撰写关于打工诗歌的长篇研究报告。

“我研究中国当代诗歌三十多年，从来没有见过海外媒体如此关注一个来自中国当代诗坛的现象。不仅有学术研究，还有诸多国际诗歌节都会邀请来自中国的打工诗人，比如郑小琼。”柯雷表示，海外对“打工诗歌”的关注，一方面源自“打工诗歌”的丰富性，涉及多个学科，包括社会学、人类学、移民研究、性别研究等；另一方面“打工诗歌”不仅是社会经验的表

达，也是审美经验的表达，有着开阔的研究空间和极大的研究价值。

在柳冬妮看来，“打工文学”是广东的产物，中国的产物，它在世界文学史上都能找出自身的谱系来。“19世纪中叶，英国就出现了工业小说，法国的文学里面也出现了大量的女工形象，包括美国文学、芝加哥文学都有类似的书写，当下中国的打工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探讨。”

吴小攀则强调，当下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已经成为一种潮流，但对“打工文学”的研究还是应该从文本出发，探讨其文学层面、审美层面的价值与意义，这是根本。同时，他也从海外传播的角度，分析了“打工文学”在翻译层面的准确性和可能性。

文学性已大大提升

“打工文学见证深圳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崛起，构成一座文学意义上的城市纪念碑。”柳冬妮表示，“劳动者之光：打工文学40年回顾展”让他感觉到打工文学的价值内涵正在被认可。回顾“打工文学”40年的发展历程，从类型化的角度去观察会更细致、更深入。在他看来，“打工文学”作家群体之间的个性其实是大于共性的，每个作家、每个阶段的作品都是不一样的。

从类型化角度来看，“打工文学”可以细化为打工诗歌、打工小说、打工散文、非虚构文学、网络文学等。“几十年，打工文学每个类型都有它的发展和代表性作家作品，比如打工小说，从深圳走出的王十月，一直在文学领域探索，从《出租屋的磨刀声》到《国家订单》再到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《不舍昼夜》，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色。”柳冬妮说。

吴小攀认为，“打工文学”已经发展了40年，当前无论是作品的质还是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“打工文学”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拓展，“对打工文学的研究需要关注到它的阶段性，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”，从而发掘出对于当下文学的镜鉴意义。

于爱成强调，打工文学是城市文学、城市叙事，绝不是乡土文学、乡土叙事。这种文学，经过了自身40年的发展，已经在文学性上大大提升，很多“打工文学”作家已跃入当前国内最优秀的同龄作家行列。“中国人的密码、中国文化的复杂性都可以在打工文学中找到痕迹，也需要打工文学继续深入研究。”于爱成表示，“打工文学”任重道远，打工文学作家应当有抱负，用笔呈现深圳新城市文学的面貌，写出一代中国人的心灵的变迁，真正走向多样性、多元化、先锋以及兼容并包的文学未来。